



赵大塘的春天

正月一过，风就柔和了起来。风从赵大塘东边岗头吹来，吹皱了池塘，吹醒了田野，吹绿了树梢，也吹润了赵大塘男女老少的心坎。

二月春风似剪刀，村口的垂柳被春风修剪得像女孩子的刘海，白杨、榆树、梧桐、香椿等也相继吐出嫩芽。燕子还没回来，但麻雀和喜鹊已欢快得情不自禁，它们在树上唱着、跳着，呼朋唤友。一年之计在于春，赵大塘人个个脸上洋溢着春意，充满了对新一年的渴望。

赵大塘的春天来了。三爷开始捣鼓他的春耕物件：铁锹、锄头、镢、犁、耙，有生锈或钝掉的，要磨一磨打一打；竹筐、竹篮、柳筐、粪箕也要修修补补，或添置几样；牛绳不够，将稻草、蓖麻捶熟了，夹上碎布条再搓上几根。老牛从厢房里拉出来，牵到水塘边饮水、撒尿，用大筲把掸掉牛身上的灰尘、杂草，拍拍牛脊，拍拍牛腰，又掰开牛口看看，再牵着牛沿着塘埂走一圈。经过一个冬季，牛长了许多膘，三爷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。庄稼人，牛就是他们的命根子。

开春了，麦菜绿油油地往上蹿。没有种麦菜的田间，都开满了星星般的紫草花。三爷将紫草花田灌上水，泡上几天，再架上牛具把田犁了，翻到泥里的紫草花烂成绿肥。三爷个子小，但结实，卷起裤管的小腿青筋暴绽。三爷是赵大塘的“活时令”，三爷忙活了，赵大塘的后生们也就动起来了，犁田，打耙，贴田埂，挖地沟，做着春播的准备，一个个像上满了劲的闹钟发条。

“过了二二月，扛起大锹把”，“二二月，赛过年，吃块肥肉好下田”。农历二二月是“大锹把”节，过了这天，一年的农忙就正式开始了。

三爷是赵大塘最有威望的人，“大锹把”节一过，他就把一年的活都安排得满满的。全赵大塘的人都学三爷的样儿。杨二老不再到处说鼓书了，腊月 and 正月，杨二老敲大鼓挣了不少米钱，一开春就带着三个儿子料理起农事。大金伯弹棉花的斧、锤、木盘也收起来了，正月不忙，大金伯又爱吃肥肉，眼见了又长胖了许多。老蒋和的鸽子天天放飞，咕哨声在早晚格外清脆，让春寒料峭的天空显得更加空旷和遥远。大哥赵延能带着一帮小兄弟，天天晚上孵黄鳝、钓泥鳅。黄鳝烧大蒜，泥鳅烧豆腐，干煎泥鳅烧豆干，是赵大塘人春上最美的菜肴。

赵大塘的妇女更不会歇着，她们里里外外都得忙，田地农活要做，家里小鸡小鸭要养，还要喂几只鹅和一两头猪。村子谁家有公鸭，就到他家去换些鸡蛋，然后回家给抱窝的母鸡孵上，三七二十一天，小鸡出了，毛绒绒的肉团儿，藏在母鸡翅膀下，叽叽的叫着，十分可爱。半个春天下来，院子里都是小鸡小鸭小鸡，叽叽喳喳的，还有小狗撵来撵去，小猫跑来跑去，好不热闹。小塘拐胡子霞老妈，屋后头张传珍大嫂，村东头吴克娘二妈，还有我母亲，今天到这家瞅瞅鸡，明天到那家瞧瞧鸡，有时端着饭碗串来串去。西头大院子住着我家、大奶家、三爷家，鸡鸭鹅常常混杂一起，为了区分，各家涂上不同的颜色，有时湿了就混了，各家养着，反正三家也等于在一个锅里吃饭。

孩子们早已开学，一个个棉袄棉裤油渍渍的，男孩子们书包里装着弹弓，上学的路有青草在抽芽，有野花在开苞含苞，有溪水潺潺着，沟渠里似乎还有残雪，虫啊、蛇啊还在冬眠，孩子们蹦蹦跳跳，上学路上充满了新奇。

我父亲也是春天中最忙的人，他在水利上工作，经常回到家帮母亲做些农活，加固塘基，清理粪窖，下种育苗，我插树木。父亲还教我在水泥走廊上用毛笔蘸水写大字，他说，一年之计在于春，一天之际在于晨，读书和劳动都要趁早。父亲是赵大塘最有文化的人，吃的是公家饭，但在赵大塘的春天里，他就是一个农民。他和三爷常常讨论庄稼，怎样提高产量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父亲从外地引进杂交水稻，单株培植，产量大心里没底不敢试，父亲带头栽，当年产量大大提高，第二年就在全村推广，父亲说，这是他一生中做得最有意义的事。

我懂得父亲话的意思，是他的做法让赵大塘人在春天里播种了金秋的喜悦。

唱戏

赵大塘东头是大岗头，地势高，又位于三个生产队交界，很能聚人气。上世纪七十年代大队演样板戏时，经常在上边搭台唱戏，唱戏的人都是本大队社员，还有下放知青，观众都是周边的群众。演员们白天干活，晚上排练演出，劲头十足。老生产队长、老党员、庄子最高“行政长官”赵东泽大伯跑前跑后，配合导演搞调度，像抓春耕生产一样。

舞台有一间教室那么大，地面铲平压实，两头各埋一根高高的抬杆，抬杆间扯上

宽大的蓝布做背景，蓝布后面是化妆和道具的后台。演出时，抬杆上挂着一盏雪亮的汽灯，把舞台周遭照得如同白昼。舞台前一侧若插上芦苇，那就是演《沙家浜》；抬杆上若挂着一盏红灯，那就是演《红灯记》。这两出戏社员们都非常熟悉，也非常喜欢，大家都要看那些放下锄头犁把的愣头青们怎么演，然后再作点评。有干部说要演《白毛女》，反映农民苦大深仇，歌颂当今幸福生活，可是没人会跳芭蕾舞，只得作罢。

舞台的另一侧，摆着几条长凳，几张椅子，是鼓手、琴师们的场所。锣鼓一响，演出开场，锣、鼓、镲子、二胡、笛子等，根据剧情依次登场。演出时，鼓手、琴师等都高度专注，引导演员入戏，同时还要调动演员情绪。这些乐师，都是当地“角儿”，排练时偶尔故意使个坏，多敲两下鼓，多拉一遍琴，叫你多翻两个筋斗，多走两次场。演阿庆嫂的换了好几个，就是与那个琴师配合不好。杨二老的鼓敲的，有时像雨打芭蕉、水落石出，有时像疾风暴雨、万马奔腾，甬说看戏了，就是听鼓也是一种令人陶醉的享受。

琴师姓牛，五十多岁，邻村人，老家在河南，十几岁时跟随父亲逃荒到本地，因拉了一手好琴，被邻村牛老头看中，入赘为婿，改姓牛。选演员时，牛琴师拉了一曲《二泉映月》，让导演潸然泪下，大呼过瘾。牛琴师特认真，细节都要按电影中的来，害得导演叫苦不迭。

演《沙家浜》最精彩处就是“智斗”一场，阿庆嫂的机智沉着，胡司令的愚蠢粗鲁，刁德一的阴险狡诈，都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印象最深的是有次郭指导员开枪打死叛徒那段，叛徒抹个天花乱，衣冠不整，斜挎着长枪，在芦苇荡边被截住，指导员抬手一枪，叛徒应声倒地。可是，负责砸低炮的人纸炮没砸响，叛徒倒下了枪没倒，忍不住抬起头来瞧看，指导员上去踹了一脚，再抬手打了几枪，纸炮终于“砰”一声响了。台下观众都轰然笑了，还有观众喊：“打死他！”“打死狗叛徒！”“打死赵延海！”

那些演员如今都七八十岁了，有的已经辞世。演指导员的是本村小学民办老师，代过我的课，1979年恢复高考时考上师大，毕业后在老家一所学院当老师。演阿庆嫂的有两位。还记得，一位是自家嫂子，唱地戏是名角，一位是下放知青，后来成为我中学老师的夫人。演胡司令的是个矮胖子，留着小胡子，会治各种疑难杂症，特别是妇科病和疥疮。演刁德一的是个赤脚医生，在小学教室排练时，他秀了一下花式踢腿，把几个女教员都看傻了。那个演叛徒的是我堂哥，老队长儿子。还有几个匪兵甲乙，记不清是谁了。看戏的人黑压压的一大片，那些台上台下窜来窜去的孩子们，现在许多都是爷爷了。老队长赵东泽早已作古，他在世时，对儿子赵延海叛徒一直耿耿于怀。

有年正月，大队安排在岗头唱“小游戏”，来看戏的人山人海，女演员长衣水袖，男演员青衣花脸，唱的是庐剧《休丁香》，曲调悲催优美，现场鸦雀无声。我大哥赵延能五马六路的，是个能人，看戏时，瞄上邻村一个姑娘，一来二去，这姑娘就成了我嫂子，嫂子人美，嗓子像百灵鸟，有事没事就唱几句，嫂子说，她喜欢李铁梅。遗憾的是，她自从嫁给我大哥，就再也没有唱过戏了。

故乡的树

赵大塘的树都是自由自在生长的，池塘边，小河旁，炊烟处，一排排一簇簇，或东一棵西一棵，不管东南西北风，你长你的，我长我的，自由而任性。春夏绿树成荫，生机勃勃；秋冬百叶凋谢，萧瑟静穆。赵大塘的树就像赵大塘的人一样，自由地活着，生生不息。

赵大塘白杨最多，虽没有北方白杨那么高大伟岸，但也挺拔俊朗，笔直的躯干，丈把以内没有斜枝旁出。从312国道到赵大塘是段机耕路，两旁整齐的白杨，像列队的士兵。盛夏，高大的白杨树撑起大片荫凉，不时有庄稼人靠在树干下休息，喝口凉茶，舒展一下他们疲惫的身躯。白杨树好裁，截其枝一小段，插在土里，浇上水，它就会成活，先是长出一两个小芽苞，然后舒展出几片绿叶，接着就是不分白天黑夜地生长，七八年工夫就“玉树临风”了。我小时候想，能像白杨树一样快快长大就好了，又高又挺拔，不惧风雨，不卑躬屈膝，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！

每一口塘周边都有柳树，柳丝轻盈垂下，有的浸入水中，风吹柳动，水面荡漾。宋诗人杨万里描写得好：“未必柳条能蘸水，水中柳影引他长。”赵大塘村口有一棵百年旱柳，合抱之木，冠盖如华，大人们喜欢在老柳树下乘凉。三月，新柳整齐垂下来，像极了小姑娘的刘海，让人怜爱。四月，柳絮纷飞，柳絮是柳树的种子，和蒲公英一样多情。但有人对柳絮过敏，满目春光好，柳絮惹人恼。我们小孩好奇，将飘落地上的柳絮拢到一起，划根火柴点上，“噉”的一下就烧没了，极易燃。柳树靠近池塘多倒插，叫“倒柳杨”，如西湖柳。我们常常折几枝柳树，盘成柳环戴在头上，大人们也学我们的样子，整个村子都是春天。

村子西头有棵桑树，约两丈高。五、六

月份桑椹熟了，我和伙伴们就爬上去摘吃，红的，紫的，酸酸甜甜。够不着的，就连枝折断，然后坐在树杈上一个一个摘着吃，嘴巴、眼睛、腮边、额头都被弄成一块块紫黑色，仿佛大熊猫。一次恶作剧，几个人吃够了，站在树杈上尿尿，正好有大人路过，以为下雨，大步走过，我们躲在树上掩嘴偷笑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赵大塘周边大面积种桑养蚕，改良过的桑树只有半人高，结的桑椹又大又甜，摘桑椹像摘豆角一样方便，但是却没了少年时攀登登高乐趣。那棵桑树，后来被雷电劈了一半，但依旧顽强地活着。

榆树也随处可见，榆树长得比较木讷，不像杨柳多姿多彩，风情万种，小时候老师经常敲我们脑袋说是“榆木疙瘩”。榆树是落叶乔木，大多长在不靠水的地方，长势较慢。幼树皮平滑，长大后树皮沟壑壑，粗糙，像老人的手。树叶呈椭圆形卵形，毛茸茸的，如玉深绿。我家老屋后有棵老榆树，听母亲哼过顺口溜：“老榆树，麻赖赖，发新叶，真奇怪，铁牛螺爬上来”，铁牛就是铁钻牛，长一对长角的昆虫，螺蛳是早螺，比水螺小。那年，听说榆树叶能卖钱，我爬高上低捋了好几袋叶子，终没见人来收，最后被父亲和晒干的水草一起加工喂猪了。听老人讲，“刮五风”时，村子里外的榆树皮都被吃光了。榆树皮干涩且苦，很难吃，但救过不少人的命，所以有人叫榆树为“榆菩萨”。

村子东头有棵板栗树，细高细高的，状如板栗树。到了秋天，树上就会结许多橡栗，毛茸茸的硬壳里面包裹着椭圆形的果子，颜色如板栗，应是同个物种。我们有时从地下捡几个，剥出里面果子，在尾部插上牙签似的小竹签，用手拎在石头上滴滴溜溜地转着玩。小时不知道橡栗能吃，直到去年偶然一次吃了烤橡栗，感觉比板栗还好吃。《庄子·盗跖》：“昼拾橡栗，暮栖木上。”杜甫《北征》诗：“山果多斑细，罗生杂橡栗。”赵翼《静观》诗：“食不知橡栗，衣不知舒麻。”乡下孩子居然不知橡栗可吃，也是一大笑话，可能那时我们都能吃饱饭吧。

庄稼人爱栽树，村前屋后栽些杂树、果木树，江淮流域宜栽枣子、柿子、桃子、梨子、杏子等。我父亲每年春上都在房前屋后栽树，院子像个植物园。他栽，也叫我栽。他说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。三四月份，香椿树发嫩芽了，父亲就去摘一点，然后香椿炒鸡蛋，或者香椿拌豆腐，再倒上一盏酒，慢慢地饮，缓解一天的疲劳。楝树三四月份开花，到了冬季，叶子尽落，树枝挂满果子，斑鸠、喜鹊都飞来叫食。泡桐叶大干直，长得快，像蒲扇一样大的叶子上经常爬有大青虫，我不喜欢这种树，于是父亲把它砍了。

桂花树四季常青，中秋节前，满树都是细碎的米粒般的金黄色桂花，满院飘香。杏花粉白羞涩，石榴花火红热烈，柿子花开在四片叶子中间，树大花小，默默无闻，不与桃杏争风。到了秋天，石榴笑开了嘴，柿子树上灯笼高高挂，母亲就摘些送给邻居，挂在红树上的，想吃就随手摘下。有时一家人围坐在树下吃晚饭，父亲指着果树对我们说，希望你们像树一样茁壮成长，将来也能硕果累累。

至今，父亲的话仍记忆犹新，故乡的树也深深扎根我的心底。

年少不知椿滋味

小时候，我家屋前屋后有好几棵香椿树，每年早春，香椿树顶就长出一簇簇的嫩头，每簇约有七八十枝，暗红色的茎和叶，光泽鲜亮。嫩头长到六七公分时，父亲就会将其摘下，于是饭桌上就多了一道菜，或香椿头拌豆腐，或香椿头炒鸡蛋，家有酒时父亲就斟上两杯，很是惬意。母亲不吃，说味道冲人，而我也觉得这味道怪怪的。我关心那被剃了头的树，时不时地去瞧瞧，看看有没有死去，或再长出新芽来。

香椿树在乡下是极常见极普通的，庄前屋后，田埂坝上，大多生长在不起眼的地方。它没有白杨、榆树那么高大，瘦瘦弱弱的，既不挺拔美观，也不是做家具的料，有时还被拾薪者一刀斩去，成为柴火。我觉得香椿是树类的“丑小鸭”，母亲不待见它，我也不待见它，只有父亲春天来时会同着它转转，我知道，父亲是贪恋春天树头上那份口福。

谷雨前后，母亲开始在菜园里种辣椒、西红柿、菜瓜等秧苗，菜园里有大蒜、莴笋、芹菜和一根茬割不完的非菜，有时母亲也捡些地脚皮，采些青蒿，地脚皮炒香韭，青蒿做粑粑，但只要父亲在家，母亲的菜篮里总是少不了香椿头。有时吃不完，就腌制成小菜。香椿头是时令菜，“雨前香椿雨后笋”，也就是二十来天可以吃，过了这些日子，嫩枝嫩叶就变成了枝叶，要吃则要等到来年了。

有次我从野外摘些香椿头回来，父亲看了说，这里面有臭椿呢，原来椿树还有香椿臭椿之分。父亲说，香椿的叶子油性大，泛红，味香，臭椿的叶子没油性，泛绿，味臭。父亲将臭椿叶挑出来，叫我闻闻香椿，再闻闻臭椿，果然香椿醇香，臭椿异臭。父亲还逼我找到臭椿和香椿作了辨别，臭椿皮光滑，香椿皮粗糙，我就奇怪了，应该香椿皮光滑臭椿皮粗糙啊！父亲说，就像有些

人，看上去像好人，实际上是坏人。要知道香椿与臭椿的区别，就要学会比较，要知道香椿的好处，就得尝一尝。那天饭桌上，我尝了尝香椿炒鸡蛋，顿时觉得香椿不臭了，而且齿颊生香，回味无穷，别有一番春天大自然的味道。

后来，我读书多了，才知道中国人吃香椿头由来已久。民间有俗语“三月八，吃椿芽儿”，食香椿，又名“吃春”，寓意迎接新春到来。《山海经》载：“又东五百里，曰成侯之山，其上多櫟木。”櫟木即香椿（樗：臭椿），香椿又称为“树上的蔬菜”，营养丰富，自古便有“食用香椿，不染杂病”之说。吃香椿习俗主要在长江南北，汉代流行，唐宋更盛，曾与荔枝作为一北一南两大贡品。晚清康有为诗曰：“山珍肥瘦身无花，叶娇枝嫩多杈芽。长春不老汉王愿，食之竟月齿齿颊。”康南海对香椿偏爱可见一斑。

在我家乡赵大塘，家家户户门前屋后都栽有香椿树，树体不大，也有个别高大些的，香椿头要用竹竿挑下来。谷雨前后，家家吃香椿，和三月三吃蒿子粑粑一样，既成习俗。香椿适应性强，耐干旱、耐严寒、耐瘠薄、耐盐碱，很少感染虫害，默默无闻，只要有春天就会发芽，只要有阳光就会生长，不在乎外表，朴实无华，像极了穷苦人家的孩子。赵大塘人享受着自然的馈赠，桑麻稻黍，四时果蔬，耕耘不歇，享之不竭，同时也在春天中孕育着一代代后人。

自从父亲叫我吃香椿后，我渐渐地接纳了香椿，后来参加工作也在本城区，生活习性一如既往，随着年龄增长和岁月变迁，愈发喜爱上了香椿，雨前椿、雨后笋、明前茶、三月三蒿子粑粑已然成为每年春季最美好的享用和期待。但是香椿吃期短，三周过后并变成树枝树叶，所以未免有惜春、伤春之感叹，乃至至人生苦短之感慨。

久居城市，所见所吃的香椿大都来自农贸市场，许多香椿都是人工培植，成了“大棚蔬菜”，再也没有小时候犹如父亲在庄前屋后采摘香椿的那种渴望和喜悦。有时清早看到楼下有大爷大妈卖香椿，我就会买一点，我相信这就是我小时候的香椿，是经过春风化雨才长出来的，吃起来会有春天的味道。有些东西在城里已经变味，但保存在记忆里、传承在文化里、流淌在血脉里的东西永远不会改变。

香椿在乡下，常常一棵变成两棵、三棵，或长成一大片，它与石榴、萱草、桂树等，被看成是多子多孙、家族兴旺的象征。唐白居易诗云：“椿寿八千春，槿花不经旬。”宋杨万里诗云：“泛以东篱菊，寿以漆园椿”，都是称赞千古长椿、经年不老的意思。

一次看见人家有“椿萱并茂”的匾额，不解其意，上网一搜，方知以椿树和萱草的茂盛比喻父母健康长寿。椿借指父亲，萱为忘忧之草，借指母亲。椿，以八千岁为春秋，而我的父母刚到六十就仙逝了，至今已二十多年矣。高堂之上，父母不在，子女未能尽孝，真是人生一大憾事！

往日的灯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我的乡间老家还没通上电，家家户户都用煤油灯。那时还没包产到户，社员们一起出工，一起收工，到了晚上，村子里的灯渐次亮了起来，透过窗户吃着微弱的火，大人和孩子围着灯坐在一起，吃着晚饭，叙着家常。小小的煤油灯跳着火花，氤氲着温暖，将一家人的心紧紧拢在一起，也照亮着明天美好的希望。



赵延文，男，安徽六安人，中国散文协会会员，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，安徽网络作家协会会员，文学作品散见于省内外多家报刊杂志。